

突、交往、交流、宽容的问题，都会被提出来，怎么解决？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通过实际调查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我在上海提倡“社区建设和研究”就是为了追求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

腹地中各类城市、乡村和中心城镇的互动关系，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区域的一般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内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生活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问题。在与上海这个中心大都市的互动中，当前长江三角洲大量的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村庄的演变方向，就会对三角洲未来的基层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比如，过去上海曾经比较封闭，加上体制方面的原因，对外的辐射力不够，后来情况变了，从浦东开发开始，全上海开放了，上海人的心理上也开放了，邻近的昆山接受上海的辐射，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没有几年就成了中等经济发达地区；江阴大桥通了车，苏北就能比较顺畅地接受苏南地区的经济辐射，很快也会发展起来，这座大桥的建成，使这个区域的经济变化加快，以至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江苏的经济发展必然对整个长江三角洲范围的发展产生影响，又反过来推动上海的发展。这种复杂的关系，值得我们学者和政界人士考虑。每一个城市、乡村的负责人，都不妨看看我们自己在整个格局中是占什么位置，各个地区要发展什么产业，发挥什么功能，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在我看来，现在上海发展所缺少的，还是作为中心都市的上海和作为腹地的长江三角洲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纽带，缺少一批围绕它的、能把它托起来的中等城市。目前的这些中等城市，虽然存在，但是在各方面没有形成完美的配合和互动，很多东西没有理顺，影响了综合、系统能量的释放，如果上海周围有了一个职能搭配完好的中等城市群，它们就可以一方面推动上海向上提升，同时又把上海的经济能量扩散到周围腹地，促进整个区域基层社会的优化和发展。

四、

总之，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经济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中国几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最繁华地带所面临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国现代化的奋斗，并不是在一片平整的空地上随意建造新的楼房，而是在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参差不齐的区位格局里选择、培育出适于未来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生命园地，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化、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化将在这里发生强烈的碰撞、交流、吸收和融合，这是一个世界文化融合的大问题，我想这也是下个世纪世界上将要碰到的大问题，我以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只有对这项巨大社会变革工程的根本性质有深入的理解和领悟，我们才有可能最经济、最有效地设计出这个巨大工程的蓝图。

【译文选载】



语言政策¹

科纳 (W. Connor)

张文义 译

如果列宁关于什么是民族性的信念可以被限制在形式的范围之内，那么什么将是错误的呢？如上所述，列宁的许多副手已经对这个有助于抑止少数民族政治分裂愿望的信念提出严正质疑（公正的说，正如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类似的，尽管有不少对成功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与决断的周期性颂歌，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却未能成功的实践列宁政治自治纲领的关键性因素，最终不得不抛弃这种政策。这些失败引发了对列宁模式的广泛质疑，甚至那些依旧忠实上演列宁主义仪式的政府也同时开始追求力图降低风险的政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传达试图抵制而不是迎合民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促进运动。已应用于实际中的方式可以归结为（1）语言政策（2）精英的吸收与净化和（3）民族群体的重新分配与政治选区的不公正划分。

语言政策

这三类中给予普遍化最大阻力的是语言政策。其模式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表现出的不规则性要比精英吸收和人口重新分配表现的不规则性要大。然而，这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追求的语言政策都可以区分出一个进化的、三阶段的模式。（1）多语制：第一阶段以官方鼓励（一些）少数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为特征，少数民族没有受到官方要求学习国家主流语言（*dominant language*）的压力或这种压力仅仅是间接的；（2）双语制：这个阶段以逐渐增长的要求学习国家主流语言的为特征，其最终目标是强制学习主流语言。例如，在苏联，从 1938 年开始，学习俄语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措施；（3）单语制：尽管没有任何政府已经达到这个最终阶段，但政府已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宣传，试图把主流语言作为组织机构的唯一语言和唯一官方语言。

有多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追溯这个三阶段过程比追溯政府对语言政策的忠实程度要容易得多。首先，这三个阶段相互重叠相互加强，而且相互连接成一个序列。其次，尽管这三个阶段构成一个进化发展的整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严格遵循一个可以明确区分出三个阶段的纯粹进化路线。在语言政策上，政府已经知道向前或向后跳跃而不只是鲁莽的回应时尚的或补偿性的运动力量。因此，正如我们以后在中国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早期快速的语言同化政策（阶段三）已被强调鼓励地方语言的需要所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对不同群体实施不同语言政策的趋势引发了复杂的问题，在同一群体的一部分人中容忍或鼓励使用地方语言，而在另一部分人中鼓励抛弃地方语言。但是，尽管有这些不规则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语言政策的历史表明鼓励民族语言的政策已明显的被双语制削弱，甚至，借助心理学的和其他措施的作用，国家主流语言已被少数民族当作自己的母语来接受。

革命前，列宁赞同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很少提及全国通用语的政策。由于对中央集权化和

¹ 本文为 W. Connor 所著的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Univ. Press) 一书的第九章 Reinforcement for the Forms 中的 Language Policy 部分。



有效秩序的偏好，列宁的模式似乎要求甚至在“振兴民族语言”的转型时期也需要一种混合语。但他私下认为把俄语作为通用交际语的政策具有进步性，尤其是在“没有强制力来推行俄语¹”的情况下。列宁没有就语言政策作出进一步的建议。

这项任务留给了斯大林及其继任者。在共产党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官方的本土化政策鼓励各民族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那时，没有学习俄语的外部压力。甚至在共和国或自治区以外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创办了非俄语学校²。三十年代初期，情况开始有所改变，非俄语学校被限制在特定的联邦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之内，而与此相反，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俄语学校³。尽管有选择语言的自由，在自己民族聚居区以外的少数民族毫无例外的被吸纳到用全国统一语言教学的学校内⁴。

另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 1938 年，斯大林强制所有学校教授俄语，以这种方式来保障俄语的国家通用语地位。接下来几年，少数民族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民族语言的年数减少了。例如，1938 年阿美尼亚（Armenia）中级学校强制民族学生学习俄语，1946 年，学习俄语成为学生的第一等大事。苏联语言政策的其他里程碑式的举措出现在 1958—1959 年赫鲁晓夫（Khrushchev）执政期间，当时居住在自己民族聚居区内的少数民族有送自己孩子进俄语学校或地方语学校的选择⁵。表面上看，“自愿原则”不过是政府对自由选择权利的一种让步。我们看到与广阔的苏联语言背景相应，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实质性的因素促使父母考虑把他们的孩子送进俄语学校。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比仅仅把俄语作为一门课程而不是一种交流方式的学校的学生更有信心掌握俄语。父母希望孩子向上爬的愿望与选择一所保证他们的孩子成功掌握国家语言的学校相关联，也就是说，俄语成为一种通向政党、工厂与政府更高阶层的语言（在同一时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环境之外，尽管拥有各自不同的民主政策，相同的原因促使比利时与加拿大魁北克领导人在佛莱德（Flander）和魁北克省反对“自愿原则”）。俄语学校对希望自己孩子走出家乡谋求生活的父母的吸引力就更大。正如非俄语学校的发展趋势所证实的那样，非本地民族的本地居民更多的是进入俄语学校，俄语在非俄语母语地区依旧是一种成功所必须的语言⁶。少数民族父母与本地非少数民族父母一样理解进入俄语学校的必要性。而且，我们将看到，在苏维埃联邦境内，民族语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如果父母关注子女的教育，那么，他们将在某个时候把孩子转入俄语学校，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从开始就送孩子进俄语学校，以便将来某个时候，尤其是在孩子的后期教育过程中，克服有可能遇到的语言障碍。

与民族平等政策相违背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语教学年数并不相同。可以预期，群体越大，在联邦政治等级中拥有越高政治地位，其本族语教学的年限就越长。直到七十年代末，那些在自己联邦共和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能够接受初级与中级（总计约十年）的本民族语教学。但生活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ASSR）内的人这种机会就十分小。许多民族只有七年的本民族语教学时间，一些只有四年，而卡累利亚（Karelians）没有民族语学校。而且，如果经过自治区从自治共和国进入自治领，我们发现一些有名无实的民族的本民族语教学年数大幅度的减少。这种趋势还无限制的扩展到对民族语教学的巨大限制上。对拥有联邦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民族所作的研究发现，本族语教学的年数在 1958—1972 年从 6.7 减到 5 年。除去拥有联邦共和国、享有十年本族语教学期限的十四个民族，所研究的其他 31 个民族的数字显示从 5.2 年到 2.74 年的巨大变化。这就是说，这些拥有苏维埃共和国地位或自治区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教学的年限在 1958—1972 年间减少了一半。1963 年苏维埃杂志社论十分赞赏这种趋势：



“当前，俄语作为交流手段在全国各民族学校中呈现出一种增长趋势。在俄罗斯 SFSR 中，从民族语学校到俄语学校的自愿转变过程在大多数自治共和国、自治区和民族地区如火如荼，它表达了父母的愿望。现在，俄罗斯 SFSR 内的 73 个民族学校正从五、四、三、二、甚至一年级中开始用俄语授课。”

十四个拥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民族中有一个民族受保障的民族语教学权利在实际中受到很大的限制。首要措施要么被解释为是专家把这十四个民族的语言作为苏维埃文化风景的一个恒久特征而作出这种决定，要么是一种在两个阶段上推进语言同化政策的策略性决定（在第一阶段，首要任务是根除没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九十多种民族语言，78%的拥有这种地位的非俄语民族的疑虑被暂时性的安抚下来。）

前一个解释能够被和平地移除是因为它与马克思、列宁的语言同化是进步的和不可避免的论断相违背。有数据显示苏维埃政府领导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与之相对，专家预测的两个阶段语言同化过程的假设与一些更重要的苏维埃同化理论吻合得很好。例如，这个假设与斯大林 1950 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预见的语言同化过程相对应：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之后……我们依然有……上百种民族语言，首先，充满活力的地方语言将随经济、政治、文化合作而出现，而后，地方语言将融合成一种统一的国际语言，它当然不是俄语、德语、英语，而是一种吸收了民族与地方语言最优秀成分的语言。”

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分析与苏维埃境内条件的类比关系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因此，（1）较弱的国家语言，（2）地区语言与（3）最大限度的单一语言与（1）没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民族语言，（2）享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民族语言，（3）俄语相对应。

分布在联邦国内的十四个民族（使用地方语的民族）并未与那些没有成立类似行政组织从而处在暂时与转换阶段的少数民族一样成为强制语言同化政策的对象。然而，这些拥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民族也未完全免于这种同化压力。确实，从政府压力对不同联邦共和国都有所不同的事实可以看出政府的权威并没有吸引住联邦共和国。数据显示，可以把政府对这些民族的权威分布称为“九比五规则”——拥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某五个民族比其他九个承受着较小的压力。这五个承受压力最小的联邦共和国是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外高加索共和国（阿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这五个享有所有权的民族拥有较高度度的民族意识和自己的语言文学传统。乌克兰也拥有这两方面的优势，但是，乌克兰与俄语同源斯拉夫语系（Slavic），专家预测这种明显的相似性使得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同化要比其他语言简单得多。但无论这种区分对待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白俄罗斯（Belorussians）（他们的语言也是斯拉夫语系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ns）、阿塞拜疆（Azerbaijani）和其他五个有民族身份的民族哈萨克（Kazakhs）、吉尔吉斯（Kirgiz）、塔吉克（Tadzhiks）、土库曼（Turkmen）、乌兹别克（Uzbeks）】并没有完全从俄语压力中解放出来，他们民族的孩子依旧与其他没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民族一样进入俄语学校。这些联邦共和国拥有十年初级、中级母语教学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同



等的进入这些学校的权利。学校的存在与学生进入这些学校的能力是不同的。在波罗的海、阿美尼亚的格鲁吉亚（Armenia Georgia），民族语学校似乎可以容纳本地所有想进入这些学校的孩子，而在其他共和国，学校的数目是不够的。五十年代中期，在摩尔达维亚，俄语学校占有所有学校的27%，其学生占有所有学生的33%，六十年代这类学校的数目戏剧性的下降。在乌克兰，五十年代，所有学校中有72%的学生学习乌克兰语，26%的学生学习俄语，七十年代，这些数据分别变为60%和40%。调查数据也反映了用民族语编写的初级与中级学校教材数目相对于其使用者人数的比较数字。有联邦共和国地位十四个民族用民族语编写的教材与其语言使用者大约只为宣称俄语是他主要语言的人的一半（53%），如果仅限于受优待的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九个民族，那么，比例将下降到大约三分之一（35%）。这种趋势分布十分广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教材远比为说俄语的人准备的教材少，白俄罗斯的教材只为俄语教材的一半。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对本地语言来说，主流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总之，数据显示，在很多但不是全部的联邦共和国内，数目增加的有名无实民族的在附近找不到本族语学校。

对个人来说，俄语作为一种制度语言在从低级教育走向高级教育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许多联邦共和国内，俄语已成为一门垄断语言。在这里，用俄语书写的教材与俄语使用者的比例是其他所有语言教材与其使用者比例的十倍。在九个没有受到优待的民族境内，这种不平均性更为明显。而且，用俄语命题的制度性入学考试给主要用民族语教学的学校带来严峻挑战。一个乌克兰人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递交的一份申请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这些使用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和俄语母语的人并不享有相同的进入高等学校的权利。俄语及其文学是入学考试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从俄语学校毕业的学生比从乌克兰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得到更高的分数。而且，特殊学科的入学考试也用俄语来组织，这让来自民族语学校的学生更难通过特殊学科的考试。因此，讲乌克兰语的应试者在竞争考试中得到很低的分数。因为竞争考试录取考高分的学生，因而能够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在初级和高级教育中接受了俄语教学的学生……”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依据列宁的制度，乌克兰的高级与中级专科教育是乌克兰化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为乌克兰语……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列宁高等教育的原则被遗忘了……在基辅（Kiev）、哈尔科夫（Kharkov）、敖德萨（Odessa）、（Dnepropetrovsk）和其他城市，高等和专科教育的教学语言都不是乌克兰语。”

1958—1959年的语言政策从给掌握俄语的人提供送孩子进俄语学校的自由转变到把他们从双语地区迁入单语地区。更具特色的是，1972年两位苏维埃作家提到语言政策向语言同化的转变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但他们否认这意味着非俄罗斯语言的衰落：“从双语向单语的转变，以及最终转向单语是民族交流的结果，并不表示民族语言的死亡”，他们并没有解释在双语向单语转变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不让民族语言死亡。

苏联专家热烈拥护这种语言政策。1961年的政党计划提到“实际上，俄语已经成为苏联境内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与合作时的通用语”。在苏维埃十五年大庆的发言中，总书记勃烈日涅夫（Brezhnev）自满地评论说：“不同民族之间不断的联系与合作导致俄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俄语已经成为苏联不同民族相互交流的语言”。



1937—1977 年政府文件措词上的微妙变化标志着从振兴民族语言向单语制的转变，政府公布的向高级共产主义进军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政府 1936 年以来的发展变化。在语言政策的措词上，从使用“权利”转向了使用“可能性与机会”。1938 年政府文件中“使用本地语教学的学校制度的权利”（121 号文件），转变为新文件中的“使用本地语与其他苏维埃民族语言的可能性”（36 号文件）和“进入使用本地语教学的学校的机会”（45 号文件）。

“使用苏维埃其他民族语言的可能性”提出了语言俄罗斯化的新的工作重心。我们已经看到，实际鼓励非俄罗斯语言并不是过去几十年中央政府追求的目标。但在 1977 年以后，政府认可了从本地语向俄语的甚至是形式上的转变。这种变化清楚地表现在政府官方文件措词的调整。以前“共产党强烈追求保障苏维埃人民语言选择的自由，鼓励每一个苏维埃公民使用任何一种他喜欢的语言，并用这种语言来教育和抚养孩子，在语言使用上，没有任何特权、限制和强制”。“没有任何特权、限制和强制”的说法逐渐消失了。从联邦共和国成立开始，阿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规定每一种本地语言都享有共和国地方政府官方语言的地位。在苏维埃政府的新政策下，每一个共和国政府关于地方语言的文件措词开始被“使用本地语言的可能性”取代。这种措词上的变化导致了格鲁吉亚首都大街上的抗议游行。游行使得政府对此作出一定的修正，旧的修辞保留在联邦共和国内，但这种暂时的回潮不过是加强了政府保持单语制的趋势。而且，尽管未能成功的转变高加索（Caucasian）共和国的语言，但新的措词已经保留在苏维埃政府的文件里面。这些为措词变化奋斗的人可以从列宁 1904 年富于策略智慧的“进一步，退两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ward）的小册子标题中寻得安慰。

尽管有许多职能上的不足，调查显示，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的语言政策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早期发展民族语言，不强制学习主流语，随后鼓励双语制，再后来就是周期性的实践单一语言的愿望。

以中国为例，在政权初期，中共特别重视非汉族语言的振兴，比如，宣称“所有少数民族有发展他们自己口语与书面文字的自由”。与此相应，政府鼓励使用多种地方语言，有时还给只有口语的民族创造该民族历史上的第一种文字。尽管政府计划面向所有民族，实际上，鼓励地方语言的努力是有选择性的。1956 年前后，五十六个政府认定的民族中只有二十二个有书面文字。这些民族多是人口相对较少。然而，许多人口数目较少的民族如哈尼、白、土家和侗族都没有书面文字。中共鼓励民族振兴语言的非情愿性的最明显例子即是满族。如前所述，满族已经高度汉化，并没有得到建立自治州的权利，然而，他们却在政府认定地少数民族之列，应当享受“所有民族有发展自己口语与书面语的自由”。

除选择性的鼓励发展民族语言外，中共还狂热的发动双语制，从政府高级官员对最初三年民族语言政策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双语制是进步发展的需要，预示了将来不可阻挡的双语制发展趋势。“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自愿学习汉语或其他发展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语言，但不能强迫他们学习”。双语制成为第二阶段，只有在劝说无效的时候才使用强力。伴随着双语制，汉语进入少数民族自治区民族语学校的教学大纲，学生们被告知汉语知识是向上层爬的一个核心因素。

单语制的压力逐渐变得很明显。在苏联，只有掌握国家主流语言才有机会进入专科与高等教育。尽管有一定数量的所谓“民族学院”给少数民族提供专科与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对多民族混合的学生群体则不得不采用汉语作为通用教学语。1961 年，在这些民族学院中的民族数目从 7 变到 46（每一学院中民族代表的平均与中位数（median）数目都为 20）。而且我们已提到，有几



个重要的民族并没有获得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权利。1968年，中央政府宣称不需要对讲汉语的群体进行本族语教学的时候，这种选择性又得到进一步提升。

尽管明确鼓励民族语教学，中共随之鼓励双语制与单语制。但这个长期计划表明对等级制度中的某些官员进行语言教育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大跃进时期，单语制逐渐浮上表面，尤其是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紧随这些革命热情，又有了民族语言政策的回潮。然而这些后来的民族语言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承诺并没有达到革命刚成功时（1949—1952）的那个水平，政府的长期政策取向指向语言同化。民语振兴的概念与1981—1982年的“非毛化”运动相应，但少数民族没有忘记曾经有过同样的承诺，但继之以民族语言同化政策性。

越南人的经历表明了一个相同但更为长期的历程。尽管1960年政府4号文件宣称“所有民族有使用他们自己的口语与书面语的权利”，这项权利并没有扩展到学校。甚至在越共控制着北部越南而不需要南部非越南人支持的时候，在老挝东部和柬埔寨（Cambodia）东北，37个政府认定的少数民族中只有四个有用母语教学的权利。除这四个民族外，所有四年级以上学生的教育都使用越南语³⁸。尽管与公开的声明相违背，越南政府立即展开一项单语制计划。而且，以下从1968年教育部文件中摘录出来的段落表明政府有尽快实现单语制的强烈愿望：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为帮助年轻一代比以前更好的使用越南语，我们现在正推进许多积极的纲领性措施。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将为泰族（Thai），Mei, Tay, Nung 这些兄弟民族创造文字，促进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学校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越南语。”³⁹

尽管南部的斗争充满疑惑，语言同化政策依然被十分有力的推行，人们毫不惊讶地看到非越南语在政府主要文件中消失这一语言同化政策的全面胜利。在取得南部胜利后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上，越共第一书记在其发言中提到“在新解放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尽快消除文盲”的需要，但他并没有提到这些消除少数民族文盲应该使用什么语言。越南语被简单的设定为通用语言。

尽管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大致相似的模式也可以在南斯拉夫发现。这个因素即是塞族语和克族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们是分离的、有本质区别的两种语言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争论。两种语言在口语上十分相似，主要区别在书写方式上。塞族语用西里尔字母表达，克族语使用拉丁字母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立场是“塞族、克族和斯洛文尼亚人都是同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拥有同一种语言和保持着同样的民族特性”。但伴随着克族不断增长的民族意识以及来自第三国际（Comintern）的威胁，二战前夕，这个立场被抛弃了。战后几年，由于强调民族语言的振兴，克族语和塞族语是不是同一种民族语的争论没有再产生。然而，1954年，在诺维萨德（Novi Sad）召开的一个各界名流的会议上，很明显获得政府预先的准许，发布了一个宣言。宣称克族语、塞族语以及黑山（Montenegrin）构成同一种语言，此后又有修订一部单一克族-塞族词典的要求。政府1918—1926年立场的恢复并非没有受到挑战。1967年克族内部十九个主要文化组织联合发表了一个与此相反的声明，声称“克族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建立一种国家通用的单一语言是在搞国家社会主义、单一神教崇拜和霸权主义”。塞族知识分子也以同样的热情对此作出回应，坚持他们自己语言的单一性。政党与政府权威尽管以恶毒的方式对付这种声明，最



终也不得不让这种争论悄无声息的留在历史记忆中。

宣称塞族—克族语是一种单一语言的努力已经成为政府建立一种全国通用混合语的一部分。五十年代末，人们并不强调这两种语言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种态度逐渐认可了斯拉夫语和马其顿（Macedonian）语的同等地位。在六个联合共和国的一个政府中，这两种语言都被认定为政府的官方语言，与克族—塞族语取得相等的地位。然而实际上，事实表明，使用克族—塞族语的人中只有 10—15%是说双语的，绝大多数的斯拉夫人和马其顿人能很流利的使用他们国家的主要语言。

五十年代，政府在民族学校中的强力推行塞族—克族语，六十年代中期，从少数民族学生初等教育第三年中开始学习塞族—克族语。而且，无论少数民族是否愿意，少数民族学校中总伴随着塞族—克族语教育。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只能穿插在一些单独的课时或部分课时中，这是一个十分有利于单语制教学的环境。而且，对优秀的、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除那些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人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罗马尼亚也经历了相似的语言政策模式。1956 年以前，马扎尔（Magyar）少数民族语学校数目不断大，但从那以后，这些学校开始切实可行地推进罗马尼亚语教学。与南斯拉夫一样，在重视主流语言的社会环境中，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只在特定的环境展开。1959 年，在罗马尼亚大学附近出现了以马扎尔语教学的大学。将近十年之后，政府高级马扎尔血统共产党员在公开的信件中向政府专家抱怨以马扎尔语以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正在逐渐减少，这已成为政府官方的但并没有公开打击非罗马尼亚语教学的政策。

在这些及其他情况中，民族语言的振兴已经在实践中被双语制，以及后来在心理和制度上采取国家通用语言作为母语的措所取代。这些使用本族语教学的愿望只能在低年级教学中实现。高等教育已经被习惯性的限制在国家通用语的范围。

尽管我们把政府对学校的控制作为语言同化政策的主要标尺，但这不是政府的唯一措施。对后期教育机会的控制，对出版业的垄断以及将主流语言的词汇强行注入少数民族语言中等措施也是导致语言同化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否有意，后期教育机会无疑推进了语言同化。在马克思-列宁政府的中央化决策条件下，后期教育对每一种民族语言来说并不可能是同等的。尽管自由选择语言的措施依然在一定地理区划内得到实施，影响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决策都是在中央作出，反映了政府权威推行全国通用语的偏好。正如我们提到，少数民族中有抱负的成员和大民族中想离开家乡追求成功的成员当然意识到流利掌握全国通用语的重要性。但这种对主流语言的强行要求也加到了大民族中那些希望留在他们民族聚居区的人身上。考试或其他通往成功的途径都用全国通用语来组织，结果是各行业也把对全国通用语的掌握程度作为一个工作要求。比如在乌克兰（人数仅少于俄罗斯人的苏维埃人的家乡），在诸如（1）“官场生活与官场关系”（2）“共产党、共青团与商会”活动（3）“经济生活与经济联系”和（4）商业行政管理活动等批判性的活动列表中俄语成为习惯的交流语言。公正的说，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斯拉夫语和俄语很相似，政府更有力的让乌克兰人接受俄语，对他们的政策力度比对同一地区的居民如阿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共和国居民的要大。但即便在这些压力较小的社区，学习俄语的刺激依然很大，这可以从下列拉脱维亚事务的描述中看出“在共和国城市、地区和其他大多数市区组织以及所有的大企业中，商业活动都要使用俄语，有许多纯粹是拉脱维亚人的集体，然而，只要集体中有一个俄罗斯人，那么会议就要采用俄语”。



本地民族语言地位低下的最有力证据是居住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几乎没有任何学习地方语言的经历。因此，在 1979 年，只有 3.5% 的俄罗斯人会一门非俄罗斯语，而有 17.4% 的俄罗斯人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之外。与列宁主义民族平等的假设相反，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都有可以称之为“成功的语言”的政策实践，而且，政府在宣称振兴民族语言的同时推进全国通用语的使用。

国家对所有出版物的垄断也是另一推进语言同化的有力工具，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除确定每种语言所能出版的主题和份数外，政府有决定某些类型的内容能否由国内的某一少数民族语言来出版的权利。

从苏联提供的数据来看，少数民族语言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三类。俄语的优势地位显得特别的突出。如 1970 年，与用乌克兰语发表的 3000 个报刊主题数目相比，俄语有 60,000 个报刊主题。甚至在乌克兰境内，用俄语发表的报刊主题占了 51%，多于用乌克兰语发表的主题。与此相似，在乌克兰，用俄语出版的书本数目为 10.3 亿册，乌克兰语的为 9,300 万册，这个比例几乎是 11 比 1，远远超过乌克兰境内声称自己母语为俄语的人口相对于乌克兰母语的人口的 4 比 1 的比例。再考察那些拥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少数民族，我们会发现这种不一致性是很明显的。与我们在考察少数民族语言学校时遇到的那种优势地位相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他们总共占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一）人均拥有的用他们自己语言出版的书的数目要比宣称俄语是自己主要语言的人数要少。用立陶宛（Lithuanian）语出版的人均书本数目为俄语的 77%，格鲁吉亚语为 67%。其他语言出版物的人均比例还不如俄语的一半。这个数目的范围从土库曼（Turkmen）的 43% 到白俄罗斯的不足 20%。

单纯的数据并不能涵盖俄语所占的优势地位，同样重要的是一种语言相对另一种所能表达的主题范围。比如说，如果高级解剖学教材只用俄语出版，对此有兴趣的医生就不得不掌握俄语。分析苏联境内不同语言的出版主题，可以得出与我们在分析民族语言教育年限时得到的相似的等级顺序。很大数目的主题只能用俄语来出版。但是，其他语言的地位也是各不相同的。只有极少的例子表明，少数民族语言能够出版的主题数目与其在联邦政府中的地位相对应。有联邦共和国地位的少数民族可以用他们语言出版八个方面的内容，拥有自治共和国地位的少数民族可以用民族语言出版的主题数目就要少得多，这样，以民族语言出版的主题数目随该民族在联邦政府中所占的地位下降而减少。如果不是因为采取相关措施的结果，俄语的地位与俄罗斯民族在政府中的地位相对应。尽管有政府公开的语言政策，苏联境内的出版物不仅在数量上也在质量上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不平等。

对出版物的垄断与对口语交流媒介的垄断相结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提供了一个把主流语言的词汇与语法规则强行注入少数民族语言的非同寻常的手段。与政府推行双语制和语言同化的意图相对应，这种发展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大量与主流语言相似的词汇减轻了少数民族学习主流语言的压力，使之变成一项比较轻松的事，使得主流语言对少数民族不再那么陌生，使之贴近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这些相似的句法和词汇减弱或防止了学习新语言时的心理障碍。最后，从主流语言中借鉴过来词汇和语法规则可以被视为通向语言同化的一个阶段。对走向语言融合和导致国家语言的出现都很有贡献（用列宁的话来说）。这也是苏联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描述的过程：



“在双语制过程中出现民族语言之间以及和混合语之间的直接互动和相互影响，以及他们社会功能的加强和发展，对双语制而言，民族语言系统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双语制中词汇的借用导致当地民族语词汇的扩大。双语制对形成民族语言风格系统有直接和中介的作用，促进大众和个体有意选择与借用词汇和语汇。

“双语制加速了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变成一个单语共同体的渐进过程。”

确切的说，词汇借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这是一个影响所有彼此分离语言群体的现象。很明显作者并没有看到这个语言互动过程与政府的强制政策相对应。当他说相互促进时，他所指的单语制加强了他所设想的当地民族语言吸收主流语言词汇与特征的单向语言过程。这种语言发展过程与斯大林在 1950 年所说的相同：

“更进一步，认为两种语言混合的结果是产生在本质上与前两种语言不同的新的第三种语言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某种语言在混合过程中会取得优势地位，保留了其语法系统、基础词库，从而按照它本身的发展趋势继续发展，而同时，其他语言逐渐丧失他们的本质而走向灭绝。

.....

“以其他语言的消失为代价，优势语言的词汇确实得到加强。但这是一个加强过程，而不是减弱。

“例如，俄语 就是一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相融合而不断取得胜利的语言。”

斯大林逝世后十年，这种情绪被一位苏联学者以极度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来：“走向语言统一体的方法是使一种最具优势的语言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在苏联，这种语言就是俄语”。这样，斯大林的语言观念延续了斯大林主义。

苏联试图使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接近俄语的作法开始于三十年代末，并在战后得到加强。这项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要求原来被强制从使用阿拉伯文字转换到使用拉丁字母的不同穆斯林群体又一次被强行接受西里尔（Cyrillic）字母，这种要求也加到了原先与他们的亲属族群罗马尼亚一样使用拉丁字母体系的摩尔达维亚之上。因此，只有阿美尼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五个受到最小民族同化压力的民族免于接受西里尔字母体系。对非俄罗斯语的俄罗斯语化运动要求少数民族联邦共和国内的民族语言学院根据俄语的规范改变当地语言的词汇和正字法。同时，通过这种从俄语中借用词汇的方法消除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词汇差异。

这些本地语言对额外词汇的迫切需求给政府提供了一个把主流语言词汇注入其中的最好机会。尽管大多数苏联西部与东欧的语言都是比较复杂、有比较完备的词库，但许多亚洲少数民族语言并不如此。结果，中国政府比苏联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以更明显的方式推行这种措施，尽管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这种政策模仿作出一定的严惩措施：

“汉语词汇并不能有力的融入到非汉语民族的语言中去，长期以来作为少数民族语言一部分的国际词汇被政府禁止。毛主义者的目标是把中国人民的语言从世界文明



中分离出来，把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限制在汉语的范围之内，试图把它们变成汉语的；不同方言。”

从他们各自的立场来看，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不加掩饰的大范围行动比苏联政府要开放得多，至少他们也更倾向于把词汇借用视为一种导向语言同化的途径。这样五十年代末期颁布的一项政府政令指出非汉族人“必须赶上在口头与书面语两方面接近汉语的时代潮流，任何试图保存民族语言纯粹性的请求都要受到绝对打击”。但尽管北京和莫斯科掩饰他们目的的程度有所不同，其主要观点都是向少数民族语言注入主流语言的词汇，这种行为因他们对出版物（包括特别重要的词典类型）的垄断而得到加强。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积极推行双语制和民族语言同化政策，尽管同时他们依然宣称保持他们振兴所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立场。列宁是否曾经把这种语言政策称为“修正主义”？在他最大限度的同化目标与他战略性调整才能的范围内，很清楚的是，他是一个生活在五十年前的人。如果列宁确信他关于民族语言振兴时间的长短会辩证地导致语言自愿混合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他将抵触这种政府政策，这与他认为人们将脱离暴力与其他设施而得到利益的初期预想相反。但是，考虑到列宁最终改变了他的观点，我们不能说政府的行为违背了列宁曾经设立的民族语言政策。我们已经提到他把单一混合语视为进步，设想将来人们会真正自愿的接受这种语言，人们在使用他们自己语言时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例如，这里我们来看他在 1919 年为乌克兰人写下的话：

“考虑乌克兰文化（语言、学校等）长期以来一直受沙皇的压迫和俄国统治阶级的剥削，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将通过一切努力来为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的自由发展扫清障碍。由于长达数个世纪的压迫，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群众中落后分子身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对这些倾向俄罗斯共产党所有成员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意识，通过一种表达乌克兰劳苦大众与俄罗斯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友好方式来劝说他们改变这种倾向。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共产党成员必须赞赏乌克兰劳苦大众在现有苏联制度下学习与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坚决与试图把乌克兰语降低为一种从属性语言的行为作斗争。相反，他们应热衷于把乌克兰语作为乌克兰劳苦大众社会主义教育的工具性语言。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乌克兰的所有政府机构中吸收掌握乌克兰语的职员，以便将来所有的职员都说乌克兰语”

把地方语言作为一种纯粹形态、作为一种有意识来加以发展以便增加其传达社会主义思想的能力的毫不含糊的称述使得建设变得困难。列宁的这种立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的专家相互指责对方政府扭曲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这种指责也同样有力地指向了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

这些歪曲仅仅简单的是为减少提高经济效率与政府整合过程的阻力而制定的实践性政策的副产品，还是代表了一种对列宁主义原理的有意偏离？考虑一般情况，一个政府（无论马克思主义政府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政府）为混和化（Babelization）将选择一种混合语（双语），为达到两个目标中的一个将选择单语制。对政府计划者来说，翻译从文学名著到机器使用指南的大量资料代表着时间的浪费与代价沉重的消耗。而且，语言的疆界也为劳动力流动设置了严重阻碍。在每



一个现代化国家中，效率与工业化给语言同化施加了压力。但对列宁的继任者来说，语言的同化却不仅仅意味着高效与便利。例如，1950年，斯大林坚持认为，生态政治不能忍受缺乏共同语言的状况：“没有一种为整个社会接受的语言，社会一定会停止生产，一定会分裂，社会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与列宁认为的语言是一个纯粹形式的观点相反，他的继任者们为语言注入实质性内容，并坚持这对初级群体的测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样语言同化走向了民族同化。

尽管缺乏精确，斯大林1913年作出的民族定义给予语言十分重要的位置“民族是一个历史进化的、稳定的、拥有相同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和心理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如果语言是民族根本性因素的话，那么当一种语言消亡时，民族也就消亡了。

斯大林的定义是随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民族研究的出发点。尽管1956年对他进行了清算，这个定义并没有被禁止，依旧被苏联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的专家引用。它对关注语言和心理同化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一项在乌克兰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只阅读乌克兰语言出版物的人当中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比例很高，尽管乌克兰语出版物和相同题材的俄语出版物的内容大致差不多。在控告苏联专家支持俄罗斯化政策时，一位中国编辑援引了苏联出版的《世界人口手册》中一则的材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他们民族语言的人群也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民族特性”。一位苏联专家也以同样的笔调写道：

“语言同化改变了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民族自身的认同。民族语言与民族自我认同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民族决定因子。改变民族的语言本身暗示了其民族意识的重新调整，已经证明，深刻的民族性改变与同化过程同步发展。如果语言与民族承继关系并不重合，结果必然的导致民族自觉意识的改变”。

在其他地方，作者澄清了双语制尽管其本身并构成语言同化，但却是一个以心理同化为目标的递进过程中的一个较低阶段，在指出双语制对借词颇有用心选择之后，作者总结说：

“双语制加速了双语民族社区逐渐变成单语社区的过程。

“然而对双语制的加强与混合语社会功能逐渐变得明显这种现象并不暗示着俄语正成为一个新的语言共同体，俄罗斯语将成为一种普遍苏联语言的不成熟结论。

“在国家并未制定俄罗斯民族成为一个单一语言共同体之前双语制就已经形成了，这只能证明甚至在民族语言这样极具区别性的民族文化中，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与其新历史社区间的和谐关系被建立了起来。”

苏联科学院的一位成员以更简洁的方式写道：“随着时间推移，在第二代或第三代，改变了民族语言的民族也改变了他们的民族承继关系，同一时期，苏联一位权威人口学家在建立民族与语言同化之间关系时也指出这一点。这两个过程被看成是同一的，“苏联所有民族中的民族同化现象是无可争辩的，尤其是，1959年人口普查显示，超过一千万——每九个非俄罗斯人中有一人——更倾向于把他的民族语列为一种语言，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民族列为一个民族，这个结果充分显示了同化政策效率”。两位苏联最有影响的数据调查专家在近期国家语言趋势和过程的调查证实了语言与民族特性之间的直接关联。其结论如下：



“双语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对民族特性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双语制是一个有助于消除民族偏见，进而加强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建立一个单一国际化社区即苏维埃人民社区的有力措施。

“每个民族地区双语制的发展与其功能是一个客观化过程，连接了苏联语言政策与更广泛的深刻影响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民族政策。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语言过程的控制（包括双语制）为影响社会与民族发展以及以一种颇有设计的方式连接国家和苏维埃境内民族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机会。”

与官方对他们的列宁主义教条的声明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的行为与其理论家的作品充分表明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译文选载】

何谓族群性？

保罗·布拉斯 (Paul R. Brass)

马雪峰 译

一种不同点至少存在于两事物之间……很显然，对于思维和感觉来说，其中每一个单独的事物都是一个非实体，一个非存在。不同不来自存在，也不来自非存在。一句话，一个巴掌拍不响。

Gregorg Bateson (1978: 78)

像族群 (ethnic group)、族群性 (ethnicity)、和族群冲突 (ethnic conflict) 这样一些词语，在英语中，已经成为很普通的术语了，它们会不经意的在报纸、电视、新闻、政治节目以及闲聊中出现。对于民族 (nation)、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词的词意渐渐变得模糊了。

在社会学里，有一个相应的发展。有证据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和 90 年代早期，有关族群性 (ethnicity) 和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的学术性出版物有了极大的增长，特别是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社会人类学的领域里，这种增长更为明显。

在社会人类学中，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族群性 (ethnicity) 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并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这本书中，对于人类学研究族群性 (ethnicity) 的方法作了特别的强调。依赖于长期的田野工作，人类学具有一种优势，能够生成日常互动层次上社会生活的第一手知识。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生活的日常互动是族群性 (ethnicity) 产生的途径。族群性 (ethnicity) 的创造与再创造，与人们的社会位置、际遇、以及人们处理生活中的需要与竞争的方式有关。从人们日常生活这一有利的观察位置出发，社会人类学对于调查这些过程有一种独特的视角。

